

批评之批评

在名词的密林中闯出生路

王逸凡

《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在金理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原博士论文题为《抗争现代名教》，以动宾结构概括主旨，言简意赅、指向明确，体现出实践的动态性；而《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则意涵丰厚，凸显“文学史视野”。这既是为了锚定主题，同时也有将“文学提供的可能性”作为最终旨归的意图。但无论如何，对“现代名教”的抗争抑或批判，是金理的目的所在；围绕“现代名教”的一系列讨论，组成了架构全书的核心内容。将难以把握的现象和朦胧的体会落到实处，是作者经过多年学术修炼而成的强项。似是而非的现代名教批判主题，经过反复考辨追究，在金理笔下，成为从繁复境界转而回到当下的、可供众人清晰讨论的关于思想的话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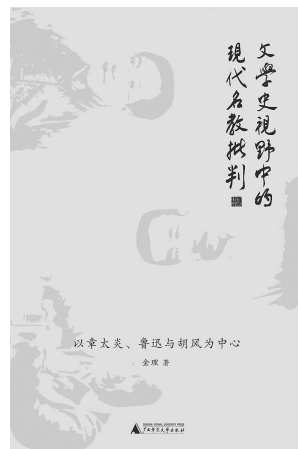
重返历史与记录时代，成为金理这些年学术工作的双重变奏。以《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火苗的遐想者：致我的同代人》为中心，对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持续关注，是作者为人熟知的一面，然而金理的抱负不止于此。一个无法回避的学术现实是，当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的“历史化”趋势，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如何兼顾现实感与历史感，成为考验研究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意义上，金理的难能可贵，便在于他有足够的学识和对历史的敏感体察。借用评论家赵园的话说，《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是一次“艰难的选择”，是对那些本该被珍视、今已被忘却的思想资源的探寻。作者以名教批判作为问题意识和贯穿全书的线索，触碰到二十世纪中颇具重返价值的研究

对象。

章太炎、鲁迅、胡风，对其中任意一位进行详尽的讨论，都将是件吃力的工作，遑论将之“一网打尽”。金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他在“遭遇思想史人物”的过程中，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只能“选择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言论与实践，为我所用，来结构新的论述空间”。换言之，正是因为有了“现代名教批判”作为串联全书的思想脉络，金理此书便无法被归类到业已成熟的章太炎研究、鲁迅研究、胡风研究当中，反而蕴含着突破学术专业藩篱、进驻当下思想场域的可能。想要使这个“可能”不致最终落空，“现代名教批判”足以担得起如此重任，作者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便显得无比重要。在前两章近百页的篇幅中，金理花费巨大精力，对从先秦、魏晋时期名实、名教问题的讨论，一直延展到对晚清民国之际名词膨胀的思想状况的梳理。“名教”的最初含义，指的是两汉以来传统政治制度和道德礼法的规范，背后又牵连着有关名实相符的哲学和语言学的根本问题。名教批判所针对的问题是，一旦“名”的世界被确立以后，便很容易被理解为真实世界本身。然而“名”与“实”并不时时等同，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口耳相传的概念，即有浮离甚至背离现实世界的危险。作者认为，现代名教是“这样一种情形趋于极端的状态”，原因在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和思想，均遭遇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西方影响。全球化时代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加深了传统名教问题解决起来的难度。在人为构造的世界图景里，中国并不必然“后

发”，自身若蕴含足够充分的批判性要素，克服固有问题的过程会成为不断更新自我的契机。然而毕竟和西方“遭遇”了，船坚炮利也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名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得到了变革。科学、民主、进化、文明……这些名词及其背后的理念、价值，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金理借用胡适的说法，指出“现代名教”的极端状态有可能通向的是“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信仰名的万能”，满足于“文字的神力”、“纸上的学说”，从而不具备介入历史实践的能力。如何重新获得介入的实践性，是金理念兹在兹的关怀抱负。在本书中，作者启用“破名”与“破名者”两个概念，想要从研究对象身上发掘内在于我们思想传统中的潜能。

金理读出家太炎的“自贵其心”与生命“亲证”，从鲁迅那里揭露“伪士”的面目，呼唤带有“实感”与痛感的知识生产能力。对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亦将其放置在“破名”的精神谱系。笔者同样关注胡风及其衍生的文学、历史问题，对作者做出的判断大致认同。举例来说，进入1949年的胡风，感知到迎面而来的新世界，虽然是为之期待、奋斗的未来，但仍存在着需要省思、疗治的文化病症。在胡风的时间里，有关文艺的讨论乃至论争，并不意味着权威的出现即能解决问题；围绕以文艺为中心的理论问题，拿政治原则作为占据思想优势和道德制高点的后盾，而不依据文艺实际的发展历史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对于胡风这样以文艺事业为己任的批评家来说，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胡风从他人的批判中所生出



当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的“历史化”趋势，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如何兼顾现实感与历史感，成为考验研究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意义上，金理的难能可贵，便在于他有足够的学识和对历史的敏感体察。

的忧虑是，文艺事业若只有空泛的政治原则作为指导方针，那么革命文艺对于总的革命事业，还能起到怎样的独特作用？金理赞扬的是胡风力拒名教的现代品格，和他那自我挣扎过程的忠诚。在历史的诡谲风云里留下铁骨铮铮的硬汉形象，胡风当得起

“第一义诗人”的美誉。不过，胡风的例子亦带有某些令人不安的思考盲区。金理体认到“主观战斗精神”这一尺度建立起来之后，“胡风几乎是用它来辨明所有文学命题的合法性”。但金理没能进一步深推的是，当胡风越来越强调作者的“主观战斗精神”，并最终凝成一个核心的概念时，有没有成为新的“公式主义”的危险？是否会违背了他曾经批判过的概念化、公式化？当他为作家们设置了更高的现实主义任务即“自我扩张”、“自我斗争”，把“与人民结合”只视为最基本的要求时，会不会因而就失去了对其他作家、批评家文艺追求的深刻剖析？胡风有他的勇气、使命感和捍卫文学的决心，以及这份气质、感觉和心态背后，难以觉察但又无时不在的，与历史共悲欢、同憎爱的骨气和骄傲。不过，这一孤绝的精神传统，如何与更大、更为广阔的中国思想版图产生互动，怎样通过合适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结构当中，以唤醒内在的向上超拔的冲动，这是每一位严肃的思考者都应时时考量的启蒙难题。

在全书结尾处，金理总结出“破名者”及其知识生产的两大特征：一是与主体自身血肉合一；二是拥有以自己的生存行动践履其精神思想的气质。最终在“实感”的意义上，文学提供了反抗现代名教、置身现实人生的可能。金理未曾迎合当下“文学无用论”的虚无主义论述，他将曾经存在过的“战斗者”的文学召唤到现实语境。恰如诗人西川所言，这是“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的思考方式，试图以知识化的途径，唤醒从知识出发进而深入人与现实的能力。

(上接第2版)

但是，我们别忘了，如果往古代回溯，我们会找到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我们会说，那时候希腊的哲学家是科学方法，他们中有人发现世界是由水构成的，因为他们看见大海，看见尼罗河的潮水在决定着世界的秩序；他们中有人认为世界是火构成的，因为他们崇拜太阳神，看到太阳对万物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中有人认为世界是由土组织的，还有人认为世界是由气化而成的。瞧！这与中国人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很相似吧？可是，今天仍有人认为五行学说是迷信，而古希腊人的那种探索是科学。可见，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新的迷信。这使我们不能站在中立的角度去认识中国的传统。

还有一个人是极有意味的存在。他叫德谟克利特。他把上述这些思想都进行了考察，并到当时的希腊半岛、中东地区甚至印度去学习过，还跟巫师学习过天文学，那时叫星相学，最终他说，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而物质是由最小的原子组织的，所以我们欣喜地认为，世界是

由原子构成的，总之，世界是物质的。

但是，我们忘了他还说了另一句话，那就是在原子与原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虚空，而这个虚空是不为人知的。就是因为不听后面这句话，我们的认识便缺了一半。这就是科学所无力达到的。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就是只有阳，没有阴。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就是只说身体的细胞，而不管细胞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虚空。那就是人的呼吸。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细胞还在，可是人死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死了呢？我们也许有人会说，是细胞间的呼吸停止了。可是它们不是物质啊，我们在说科学的时候，在用放大镜、显微镜透视的时候并没有在乎过那些虚空的存在。

所以，我们引进的现代科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部分而已，但我们将它当成唯一的尺规。当我们再也看不见那些虚空的存在时，我们只知道人是需要吃的、住的、穿的、行走的，可在虚位上存在的道德伦理呢？难道不需要它吗？显然是需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需要，但我们如何在实验室里建设人类的道德伦理大厦呢？

中国古人说得好，这世界上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叫知，另一类叫未知，合起来才是知识的全部。孔子说，“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过去我们解释得片面，他的本意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意思，把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全部加起来，就叫真正的知，也可以说是智慧。知道的和看得到的东西称为阳，看不到的和说不清的称为阴。这才叫科学。所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拿西方“科学”一词而把我们的一部分文化否定。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科学”一词。中医就是被这样怀疑和否定的，因为它不科学。这里的不科学不是中国的科学定义，而是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定义。为什么我们不拿中国文化去重新衡量西方文化呢？只有彼此否定不了的东西，可能才是我们沟通的桥梁。是我们自己把天平放斜了，这怪不得人家。比如，中医是靠阴阳五行思想发展而来的，后来还和《周易》、天干地支结合起来发展了经络学，也就是针灸学。它有什么大的问题吗？西医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

以它就简单地否定了这些运行了几千年的理论。但中医呢？很委屈，它面临着西方科学世界观的一次检验，说透了就是微观世界的一次检验。

我认为这个检验也非常有必要，它在检验中可能是对的，但我想，有一些很可能就是错的，因为中医是不固定的，与人的天赋和经验有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根据西医的人体解剖学把这一学问纠偏和进一步完善，岂不是更好，岂不是可以造福全人类。所以我想，这对中医也是好事情。

我不赞成简单地信仰西方文化和西医的科学观念，也不赞成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和中医理论。以我十五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十二年对西方文化的教学思考，深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真正可取的态度是中庸之道，取长补短。

这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副产品，其实是更为深沉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人类精神文化中的病理现象。它已经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但首先要我们中国人来解决。从某种角度来讲，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一种幸事。